

·门外弹乐·

音乐表演至境在“打动人”

□梅明蕾

我喜爱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不久前再次录制了巴赫大提琴六首无伴奏组曲，受到业界和乐迷关注。重录这部经典期间，王健与乐迷和媒体常有互动和感情，有些看似老生常谈，在我看来，却是日说日新的要点。

如这则《学音乐，不要以难度论高低》。王健认为，很多琴童家长以为音乐的高低是以难度来决定的，其实不然，最终评价标准应落在正确的音乐表达上。王健感念父亲在自己幼年学琴时送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那是一个理念：演奏贵在“好听”；“最简单的几个音你都要拉得让人感觉很美，这是最高的本事”。

一个“好听”，平白无奇，却直取要害，显示了一个大师级演奏家对于音乐表演核心的洞见和强调。

“好听”内涵丰富，很大程度体现在歌唱性上。遥想1979年，美国著名小提琴大师斯特恩应我外交部邀请访问中国，普及古典，发现人才，畅叙友情。这一影响深远的访问后来录制成纪录片，其中许多细节，至今看来都意味深长，令人难忘。

一位音乐学子拉小提琴给斯特恩大师听，大师听罢，让演奏者将乐曲旋律唱给他听；然后又嘱学生像刚才唱的那样再演奏一次；学生照办，大师连称“Very good”！显然，大师赞扬的是她在演奏的歌唱性上的改进。

斯特恩的那次访问也成为王健音乐生涯的转折点。那时才10岁的他有幸在大师面前表演，乐曲虽难度不高，却展示了作为琴童的王健罕见的激情和感染力。王健因此被斯特恩选中赴美学习。

说到“好听”，最要提及莫扎特的作品。我早先不理解，论技术，莫扎特的作品远非最难，为什么无论国际性音乐大赛，还是乐手应聘考试，都必须演奏莫扎特？后来渐渐知晓，那是因为莫扎特作品的天成自然，行云流水，如歌如诉如天籁，

·序跋集·

王维的诗如《三体》的“水滴”

□李让眉

说起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不一定是王维。但若经多次追问，这个名字出现的序位该也不会跑出前五。

王维常常出现在中国小朋友与诗的第一场邂逅里：孩子开蒙，少有不曾背过“红豆生南国”“空山不见人”，的不独如此，古时亦然。他的五言清逸流畅，兼具音乐性与画面感，是个舒适开放的美学端口——更难得还在成长性：王维的诗儿时读来可亲，大了观之忘俗，不学诗的觉它清新成诵，学过诗的对比过诸多仿作，则要益发敬畏它准确微妙。

能做到在每一种视觉焦距里都美很难。看过《格列佛游记》我们会意识到，巨人国里娇俏的女郎，在小人儿眼中不过是皮肤粗糙不堪、颜色不一的怪物——能做到入眼可爱，且每走近一步，每深入一层仍能美而不失度，其中必然包蕴着高于观察者理解层级的技艺。

科幻小说《三体》里有段情节，说三体文明派了一只被人类称为水滴的探测器来到太阳系，它小巧光滑，好像一滴水银。起初因为体积小，它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当科学家在一千万倍的、可以使大分子显像的显微镜下观察时，发现它的表面依然绝对光滑，才迅速产生了敬畏——后果也确实证明，在这个小而美丽的水滴面前，技术落后的地球舰队虽然庞大，但粗糙到不堪一击。看到这段剧情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了王维的诗：它正是与水滴一样的小巧、匀滑，拥有完美而看似毫无攻击性的弧度。

·无限杂思·

逆向时间的视觉景象

□刘洪波

我们所经历的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顺序不可以改变，线索不可以重合。

这是生活经验。人类从古至今，个人从生到死，都是这样经验的。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未来就是未来，我们既不能从过去来到现在，也不能让未来与现在“同时”出现。

这也是科学定律。孤立系统总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一只杯子从桌子上落地摔碎，而不会复原成杯子回到桌上。熵的增加决定了时间的方向，以及宇宙的最后寂灭。

如果不是这样呢？那么，我们就来到了幻想世界。我们可以干涉过去事情的走向，从而弄出一个不同的现在来，例如可以让杨玉环不吃到荔枝，也就不会发生很多人和马累死在送荔枝的路上。当然，这也会触发“祖父悖论”，一个人跑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他做了这件事，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他。

电影的造梦功能，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时间的“不真实”来实现的。蒙太奇的化入化出、剪辑的前后穿插、节奏的加快与减慢，都是用时间控制来讲故事，可以说电影是一种直观的时间控制技术。

小说《时间机器》出版那一年，正是电影诞生的那一年，1895年。“时间机器”刚开始只是纯粹的幻想，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以后，关于时间旅行的幻想就增加了科学色彩，变成“科学幻想”，随之出现了大量用影视来表现宇宙飞行和时间旅行的视觉作品，它既便于制造奇异故事，也利于展示“大片”景观。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电影，讲述回到过去，或者前往未来。克里斯托弗·诺兰编剧并执导的《信条》在时间穿越类电影中，搞出了新意思。

一般地，我们看到的时间穿越类影片都是利用时间穿越的便利，去改变事物的进程。例如一个1985年的人来到了1955年（《回到未来》），帮助老爸追老妈；或者一个2035年的人被派到1996年（《十二猴子》），调查灾难的起源。时间是改变事态的一个关键工具，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武器。

在以往所有的时间穿越类幻想中，即使可以回到过去，直抵未来，但时间的前进方向仍然没有改变。你从1985年来到了1955年也好，从



梅明蕾 媒体人、爱乐者，读写联袂。

正好作为考验乐手演奏歌唱性的试金石。

音乐演奏领域神童辈出，多数人看到了他（她）们身上的神乎其技，却忽视了神童们对音乐本身少有的感悟力。天才少女小提琴家蔡珂宜在一场音乐会上演奏老柴著名的D大调小协。有人问她，以10分制，怎样来评价这部作品在技术和音乐表达上的难度？小蔡当场回答，技术7.5分，音乐表达10分。换言之，演绎这部经典她自信技术上已能做到游刃有余，而音乐表达上她还须全力以赴。说明经典音乐的演绎存在无限可能，“好听”可呈现无限丰富的面向。

王健为当下“学琴以难度为成功标准”的取向感到担忧，“那样的话，学生就会对演奏的音乐性变得淡漠”，相关追求也就失去了动力。在人们印象中，我国音乐教育的强项是基本功扎实，但人大艺术学院副教授房博然日前却提到，在很多邀请而来的国外音乐家眼中，我们的所谓“强项”，毋宁说是“有所欠缺”。房博然转译了外国专家的看法：基本功一般应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外在（肌肉）机能、听觉能力和感受力。我们的音乐教育往往片面强调了第一点，而忽视了后二者；反映在音乐学子的表现上，往往长于炫技，而疏于对音乐作品的深入理解，更在音乐形象的设计和构建上显得贫乏。音乐“教育”有下滑到“培训”层次的趋势。

音乐表演，强调技术水准不言而喻，但技术再重要也是手段，是要服务于音乐表现。央音研究生、青年钢琴家王丽雅日前在德国举办的ARD国际音乐大赛上斩获头奖。王丽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最看重的评价莫过于“你的演奏很打动人”。她说，如果一辈子只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这句话了。诚然，音乐表演的至境，莫过于“打动人”。



摘编自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序章，标题有改动。

王维的诗也是用方块字组成的，同样遵循基本的格律，却没有近体诗特有的编织感。它很难被还原成一个个像素块，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用结构构造的方法去拆解他的语言——王维拥有令大多诗人深羡的语言天才，但他诗的好处则完全在语言这个维度。

古往今来，中国的好诗很多，但能同时禁得起不同角度审视的却很少。有的诗朗朗上口，但文辞粗陋；有的诗意象华丽，却屈屈整牙；有的诗初见无味，要有阅历才能看出好处来；也有的诗乍看惊艳，却没有挖掘空间，禁不起成长后的回望。凝固的文本很难跟随读者变焦进行自我修正，而对大部分诗人来说，他们的魅力与缺陷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此之蜜糖，彼之砒霜，优势与劣势的消长从来只在于诗人自己，读者的偏好也是重要的定义者。

但王维的诗却是个圆匀的弧形：他没有预留撒手铜，也相应失去了破绽——换言之，王维不是一位适合用现有诗学体系去定义个性的诗人，硬要去套的话，他可能在每个维度都刚好处于八十分的位置，均衡得令人提不起警惕，又仿佛是由于某种有针对性的设计。王维的诗从来不是我们情感上有紧急需求时可以即拿即用的工具，但同时，它又似乎总在不经意的余光里安然存在着。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想在这十五天里和你一起探索的。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1996年来到了2035年也好，在1955年或2035年，时间的方向仍然是确定的、正向的，那就是从1月向12月、从上午到下午。

还有一点，你来到了1955年就在1955年，它会影响到1985年，但1985年不会直接与1955年混在一起；来到了2035年就在2035年，1996年也不会与2035年并置在一起。

《信条》改变了这些套路。首先，时间直接武器化了。“逆向武器”进行的攻击是结果在先的，先是人体开花，后是子弹回到弹匣。这还只是枪弹，大规模逆向武器可能不是让世界重启，而是让世界消失，正向世界与逆向世界的见面，如同电子与正电子相撞、物质与反物质相遇，意味着世界直接湮灭。

其次，逆向时间类似于时间过程的“倒放”。从正向时间来看，它是碎片变成了杯子，并从地上回到了桌子。这样，它就是从未来奔向现在和从前，是正向时间的一个全过程镜像。后变成冰，先变成后，从结果倒退到起点。火烧变成冰冻，吸进氧气变成氧气从肺里呼出，躲进弹坑防炸弹结果被回到弹坑的泥土掩埋。

再次，逆向装置既可以将人投放到过去，正向地走到现在，也可以征调未来，逆向地倒回现在，于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发生了混杂和并置，现在成了所有时间汇聚于当下的时间纽结点。正向部队与逆向部队交织攻击下，一栋大楼要被未来部队炸一次，又被正向部队炸一次，楼板就来来回回地飞。

《信条》的故事仍然是英雄拯救世界。坏人得了绝症，又觉得世界已经坏了，就要拉世界来陪葬，对世界搞硬重启。一旦得逞，不仅现在的人全部不得生存，未来的人也无以获得出生机会。于是坏人就成了现世英雄与未来人类的共同敌人，他们发起了时间的锥形攻势，对坏人发起正向和逆向攻击，最终坏人被消灭了。

在诺兰的作品中，《信条》不能说是成功之作。因为逆向时间过于烧脑，人们难以进入故事逻辑。不过，就算被“看懂了”，它的情感表达、思想表现都是欠缺的，最多也只是是一部拥有影像奇观的爽片而已。



郑振铎。

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史。作者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讲述他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机智躲避明枪暗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作者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挖掘众多多视角的新文獻、钩沉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仁与战争夺典籍珍笈的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为国家赓续文脉，于乱世显证情怀。本书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

在战火中为国家搜求古籍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的家里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1938年春，巴金在回答一位身处沦陷区的小读者来信时说：“这里还有一两百万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理。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

在郑振铎的公开文字和日记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甚至有一种赎罪的焦虑感。许多已经迁往内地的朋友都曾责怪过郑振铎：为什么不到内地去？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大学图书馆损失更多，公家劫余残书，散落于市面上。此外，沦陷区的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流入上海，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收购，必将流出国门，最终酿成“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陈晓明《现代的形成与拓路》：从文学史到文化工程

□周成全 李海英

由陈晓明主编的《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追问的不是“现代是什么”，而是“现代如何形成、如何继续开路”。在这一意义上，这套书将现代文学研究从现象探究与文本阐释推进为具有生产性的文化工程学，把百年中国文学进程转化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可实践框架。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面向”替代线性通史，是该书最突出的方法论创新。与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类著作不同，这套书并不局限于“概述一流派/思潮一作家/作品”的线性叙事，也不依赖于现代性、启蒙或民族国家等理论统摄全局，而是通过“面向”这一方法论创新，将对文学进程之考察转向问题导向与现实关怀。比如，第一编对鲁迅“反传统”的再阐释，既回到现代性生成的起点，又将其价值冲突引向当下伦理治理的讨论；第二编从“中西体用”之争论延伸到“走向世界”的多种模式，从多重经验提炼为一组可操作的制度策略，包括互译、对话及全球语境中的文化位置经营等；第四编“伦理主题”将伦理讨论与制度现实以及情感结构相接，使文学伦理学研究与当代文化政策与公共教育形成良性对话；第六编则把新媒体革命的美学后果纳入文化建设进行考察，深度分析感知结构的转型如何推动新的审美经验生成，并进一步转化为文化认同

快览>>>

《我和杨叔子》
徐辉碧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徐辉碧记录的与杨叔子相遇、相知、相伴、相守的一生，首次揭示了杨叔子人生中诸多未曾公开的细节，坦率地表达了二人对青年读者的无限期待。徐教授坦言，写作此书，是为了完成杨院士的嘱托——将他成长历程中的体悟传递给年轻一代，助他们少走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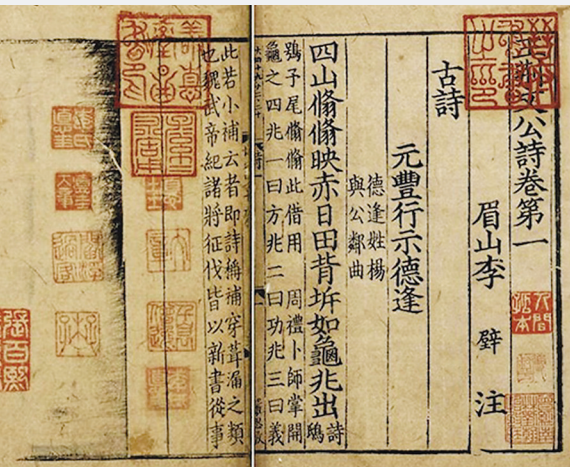
《消息》
贾平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贾平凹长篇笔记体小说，延续作家“努力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的心意，以传说式的绮丽想象与仰观俯察的宏阔视野，将天地自然、历史民俗与世道人心紧密交织，在充满灵性的意象与文字之中，叙写一个又一个生长在秦岭之中、中国大地上的生命故事，勾勒出一幅当代“山居图”。

《笑翻中国简史》插图版
马伯庸 著 晓航颜 绘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本简练、生动的图文版两千年中国通史。揭秘历史幕后的文化伏线，解读历代王朝的“天命”之谜。上起战国秦汉，下至晚清，成王败寇的历史卷轴中竟藏着如此一本正经的王朝更替理论。初看捧腹笑翻，再看掩卷长叹。

“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更多更重要” 《暗斗》记述一段文化抗战史



郑振铎抢救的珍贵古籍之一。

他坚持不接受大后方发来的车马费，说：“负责收书，纯是尽国民应尽之任务之一，决不能以微劳自诩，更不能支取会中分文，以重罪愆。”

“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为了抢救和保全古籍，郑振铎主动过着艰苦的生活，甚至拿身家性命冒险。

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这样一位五四宿将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古董”，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连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都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

巴金甚至说：“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之与敌人同归于尽。”然而，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做法。他认为，沦丧的国土可以收复，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无从弥补。他在抗战胜利后撰文重申这一观点：

“抗战的十四五个年头以来，国家和国民的损失，简直难以数字来估计。其中，尤以文物的损失为最不可补偿。珍宝、房屋、工厂，以及其他种种物资毁光了，都可以有办法向敌人赔偿，房屋可以建筑得更新式、更合理；工厂可以设备得更现代化、更大，更有效力。但文物一旦被毁灭，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永远永远地不会再有原物出现，而那原物在文化上、在艺术上、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不仅是中国先民们的最高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们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

巴金晚年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书，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吴真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与敌人赛跑，打通“孤岛书路”

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说，“然而我不能走”。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万五千余种”。

仅1939年底至1941年秋，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们就抢救了近6万册古籍。他自己也倾尽财力购藏，经他手抢救的书籍总数估计达十几万册。

抢救之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最珍贵的3万册善本安全运出被海陆封锁的上海“孤岛”。他们规划的路线是先运香港，再船经马六甲海峡到仰光，再经陆路滇缅公路辗转至重庆。第一关——上海到香港——就极其凶险。他们将古籍善本精心伪装成普通邮包，混入书店每日发往外地的上千个包裹中。在两个半月内，2700多个这样的“邮包”瞒过了日本特务的耳目，顺利抵达香港！这段历史令人热血沸腾，是普通人与书生共同打通的“孤岛书路”。

然而，运抵香港后再生波折。1941年10月，为将书籍转运至美国暂存，需要在每本书上加盖中央图书馆的印章。耗时两个多月才完成盖章，结果耽误了船期，12月25日，香港沦陷，这批书落入日军之手，被劫运到了日本东京。所幸，郑先生此前应中央图书馆要求，手写了一份极其详尽的善本目录。正是这份目录，使中国代表团在1946年初得以在日本东京的帝国图书馆按图索骥，成功追索回全部书籍。

留在上海的另外3万册古籍，则由郑先生和几位朋友设法藏匿于佛教“法宝馆”和两处民房，躲过敌人审查，安然保存至抗战胜利。

1945年抗战胜利，郑先生在《求书目录》中写下一句话：“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更多更重要。”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课程教学、公共写作与文化政策论证的知识模块



《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
陈晓明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课程教学、公共写作与文化政策论证的知识模块；其次，章节之间互为呼应，设定的六个“面向”，既不放弃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又能在不同场景中灵活重组知识模块，便于学界、媒体、教育与治理等多个环节共享；再次，在平台化、全球化与算法化的当下情境中，本书提供了可见的策略路径；更新感知、重建伦理、再构叙事、连接世界，使文学研究不只是一学术阐释，而是成为应对现实问题的有效资源。

质言之，这部著作既是一部知识地图，也是一份实践蓝图，它强调“现代”不是完成时而是持续再生产的进行时，由此把百年中国文学转化为今日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与“资源库”。

《科学桂冠的启示：诺贝尔化学奖》

姜雪峰 朱晶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以历年诺贝尔化学奖为脉络，书写了化学桂冠的百年史话。在分子结构与人类文明之间，铺展化学演进的瑰丽画卷。作者带我们轻松“打卡”化学键、分子机器、冷冻电镜、AI预测蛋白结构，也讲述了科学家在实验室内外的逸闻趣事、人生悲欢，展现了化学学科范式跃迁。

《狮吼人生：奇女子巴斯妇传》

[英]玛丽昂·特纳 著 汪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巴斯妇是英国文学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她以大胆粗俗却真实可爱的坦率之语，成为中世纪文学中最具颠覆精神的女性形象。她积累财富、挑战权威、坦然面对欲望，构建了一套独立于父权社会之外的生存哲学。这不仅是一部有关一个文学角色的传记，更是一部女性史。

《海盗与启蒙：真实的利博塔利亚》

[美]大卫·格雷伯 著 姜昊萼 译 九州出版社

本书是文津奖图书《人类新史》作者之一大卫·格雷伯的遗作。他发现，18世纪马达加斯加岛上定居的海盗集团进行过大胆的政治和社会实验，海盗们生活在某种自治的原始民主社会中。作者试图从马达加斯加岛的历史中寻找人类的某种规律。本书也是作者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又一部作品。（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